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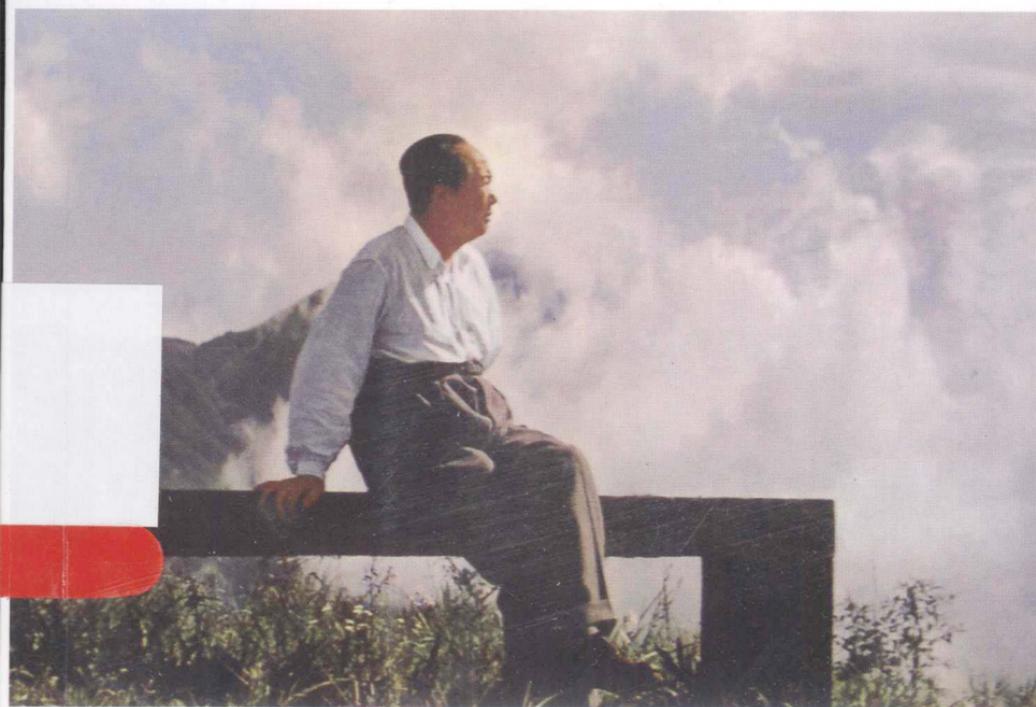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忧患百姓忧患党

——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修订版·大字本)

李慎明◎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本书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概念的提出、产生渊源、发展脉络、最终形成和相关思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这对于各界读者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和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有特殊的启迪意义。



ISBN 978-7-5097-4915-9

定价：20.00 元

013057477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

A841.6
06-2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忧患百姓忧患党

——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修订版·大字本)

李慎明◎著



A841.6

06-2



北航

C166899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大字本/
李慎明著. —修订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ISBN 978-7-5097-4915-9

I. ①忧… II. ①李… III. ①毛泽东思想 - 中国共产党 -
党的建设 - 理论研究 IV. ①A84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3926 号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忧患百姓忧患党 (修订版·大字本)

——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著 者 / 李慎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仇 扬

责任校对 / 万伟平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刘 娟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8.375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2 版

字 数 / 86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4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915-9

定 价 / 2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01302747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谨以此小册

献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北京出版集团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编 委 会

总 编 李慎明

执行主编 陈之骅

编委会委员 吴恩远 程恩富 侯惠勤

谢寿光 张树华 姜 辉

王立强 樊建新

修订版前言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出版后，不少人关注。阅读了该书后，有的领导说：“小册子我一口气读完，总感觉是不回避矛盾、有事实、有观点、深入浅出有说服力，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有军委领导说：“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非常深刻，很有见地，对于全面准确领会毛主席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指导价值，更加自觉地做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工作，有着很强的借鉴和启迪作用”。也有不少读者说，不管赞不赞成该书观点，希望更多人能读读此书。也有一些领导和读者提供事实，建议笔者尽快做些修改，出

修订版,以进一步增强本小册的说服力,有助于广大读者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并更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①如江泽民所说:“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②如胡锦涛所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③如习近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47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第612页。

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642页。

所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①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荣辱、功过与是非。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只有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才会有着无比光明灿烂的前程；否则，必将会重新遭受极大的灾难和苦难。

本小册修订版的修订处，主要有：

一是在本小册的引言部分，在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例证中，增加了1975年7月28日，即毛泽东刚刚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的例证。那天，毛泽东在读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他先是

^① 《湖南日报》2011年3月24日。

“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笔者认为,从目前已知的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

二是在本小册第一部分增加了对 1976 年 6 月 13 日毛泽东关于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确定性与真实性的辨析。

三是在本小册第三部分增加了毛泽东在 1954 年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在宪法中对保障政权不变质的法律框架的相关设计。

四是在本小册第四部分增加了毛泽东关于劳动者应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包括像报纸刊物、广播、电视这类东西权利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关于“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

重”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关于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等论述的相关内容。

五是在本小册第四部分的结尾时，增加了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的一些思想的试析。

六是在本小册第五部分“相关思考”中，增加了第1点，阐发了一定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前27年艰辛探索并取得伟大成就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第8点，阐发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牢记毛泽东的“两个务必”的谆谆教导并切实身体力行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本小册的修订稿，恰好完成于党的十八大圆满成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之时。党的十八大报

告和习近平同志最近几个十分重要的讲话，使得笔者进一步坚定了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明美好前程的信心。

李慎明

2012年12月8日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 小丛书”总序(修订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慎明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套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理论读物,又是我们集中院内外相关专家学者长期研究、精心写作的严肃的理论著作。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

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新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蘋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

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是否可行?当然,为方便年纪大的阅读的大字本适当可定价高一点。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

2013年3月18日

目录

CONTENTS

- 1 | 引言 从毛泽东晚年几次痛哭谈起
- 29 | 一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概念的提出
- 49 | 二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
- 63 | 三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

92 | 四 毛泽东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思考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及对阶级斗争全局形势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估计

146 | 五 相关思考

引言

从毛泽东晚年几次痛哭谈起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顺手查查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3年12月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的记载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在其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

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4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①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基层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分困难的生活状况和“文化大革命”对全国生产与人民生活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泽东下决心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②的依据之一。

如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读了根据他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658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40页。

的指示有关部门写出的详细叙述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后,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可以说,这其中可能也有毛泽东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误失察的认识和反思。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泽东刚刚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亲自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这么叙述的: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41页。

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①。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等奸邪，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朝廷置之不理。出于爱国者的责任感，陈亮又于1178年一年之中，连续三次上书，由于奏疏直言不讳，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偷安和儒士们脱离实际的空谈之风等，遭到了当道者们的忌恨。陈亮曾两次下狱，经受严重打击排斥，但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为驳斥投降派所谓“江南不易保”的谬论，亲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观察地形，并准备

^① 卢春宁：《为毛泽东做眼科手术的医生——唐由之》，人民出版社，2011，第110页。

依据实际调查结论,再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一系列经营南方、进取中原、统一国土的具体建议。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陈亮挥洒大笔,在词中直抒胸臆:“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①毛泽东离我们而去已经36年多了。当年领袖内心深处的真实境

① 毛泽东当年所参阅的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译文:

我登上高楼,向四处眺望,可叹我的见解,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曾经领会?山川形胜,仿佛神造鬼设,竟然被认作天然划分的南北疆界。北面横陈着长江,东、西、南三面连接着山冈,这里完全是可以争雄中原的好形势,六朝的士大夫们,除了有利于他们一家一族的自私打算之外,究竟还做了些什么呢? (转下页注)

况,很难准确揣度。但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无疑直通700多年前的陈亮。从目前已知的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正因如是,笔者在这里特用较多一点笔墨加以阐发。有人认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是一首批判现实、积极进取、气宇轩昂、鼓舞斗志的抒情词。而笔者认为,陈亮此词无疑是借古论今、批判现实之作。此词下阕之中也不乏“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气宇轩昂、鼓舞斗志之旋律,但

(接上页注①)最可笑王、谢之辈,在登高怀远的时候,也要装模作样,洒几滴英雄泪。他们仗着长江天险,偏安一隅,哪管广大中原地区已被占领,充满了腥膻之气。如今正是长驱北伐的大好时机,不当犹豫退缩,要继承祖逖中流击楫发誓的精神。试看谢玄当年一举破敌,决战取胜的局势业已形成,又何必还去问南疆北界!

——卢春宁《为毛泽东做眼科手术的医生——唐由之》,第

113页。

陈亮深知,这仅是“应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和“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则是“实然”,即“无情现实”。多景楼本身是座危楼,还是作者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楼”,亦可能兼而有之?笔者无从考证。但此词的主调却是作者抒发内心诸多的忧患、积愤、悲愤乃至无奈。在我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两个政权,都被北方强敌击败流落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当权者却都不思收复失去的大片国土而偏安一隅。大凡读史,常常会引人共鸣。深谙我国古文的毛泽东,阅诵古文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沟通古今,古为今用,以推助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阅诵陈亮这首词时恸哭失声,我们对毛泽东此时强烈共鸣的内心世界如何较为准确地揣度、把握和诠释呢?笔者试谈如下四点陋见。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泽东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此时的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地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

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但从国内看,“文化大革命”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疑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这一结论。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毛泽东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还作

^① http://www.gov.cn/test/2008-06/04/content_1005155.htm.

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②等石破天惊的结论来。在毛泽东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联系到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1页。

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①，“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②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四人帮”一系列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③等严肃批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④;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15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26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5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26页。

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泽东,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①的评价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泽东曾经喟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②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雄悲壮的感叹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共鸣是很自然的。

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国家和民族虽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干部为了个人

① 卢春宁:《为毛泽东做眼科手术的医生——唐由之》,第91~9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07页。

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和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①，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流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令人悲叹。

三是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九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

^① 王、谢是东晋初南迁的两大家族，这里泛指以王、谢家族为代表的贵族士大夫阶层中那些有声望地位的士大夫。陈亮在这里是嘲笑这些人虽然也学得像英雄那样感叹山河变异，但只是故作姿态，却不会去收复失地。

命”已有明显的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 82 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浸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之中，毛泽东的忧患、

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从中而来。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

四是人在生命之烛即将燃尽之时，往往会像老牛静卧反刍一样，咀嚼着眼前浮现的一生“奋蹄”的一幕幕历程。1975年7月28日，距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整整五十四年多几天，距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还有一年一个月多几天。诵读700多年前陈亮的这首词，回首自己亲身参与甚至是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艰辛奋斗和苦难辉煌的革命历程，揽扫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势，展望中国与世界可能发生的各种前景，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有多少特有的体味和话语会涌上他的心头呀。曾担任过周恩来晚年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说：周恩

来晚年一天夜间工作劳累之余,在西花厅院子里望着一盘月亮长叹。张佐良劝道:“总理呀,有什么为难之事,倒说出来,否则,容易憋屈出病来。”周恩来苦笑着回答:“那仅是从你们医学和医生角度讲的道理,我的为难之事和为难之言,能说给谁呀?”周恩来有周恩来的为难之事和为难之言,毛泽东当然也有毛泽东的为难之事和为难之言,各有各的难处。但俩人都有很多事和很多话不能对外人说道原因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党的纪律。另外,毛泽东对我国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确实有所偏爱,每遇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会到我国历史中汲取营养,或在览阅我国传统文化典籍时联系当时国际国内的重大现实问题思考,以沟通古今之间的联系。在风烛残年之时,毛泽东虽然已经认识到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在实践的进程之中确有“三分错误”，但他却仍坚定和充分地肯定其中的“七分成绩”和“基本正确”，特别是肯定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此时的他可能以为自己有很多无处和无法倾诉的衷肠，或是一片苦心不被别人甚至是不被战友理解进而被误解、厌烦直至怨恨，当他在700多年前的陈亮的这首词中找到知音之时，其郁积既久的苦闷、忧虑直至委屈之情则可能通过失声痛哭宣泄得一发而不可收。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① 14日下午，工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64页。

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①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

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②另据毛泽东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当电影《红灯记》放映到李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65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页。

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主席难过地哭了，喃喃地讲：“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①以上两个例证可以作为毛泽东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②这一谈话的心灵的注释。

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

① 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69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0页。

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①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47页。

(最终统计为 24.2 万人死亡,70 多万人受伤——笔者注),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①这体现着他把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晚年毛泽东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泪水?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他与他的战友们,历经艰辛,指挥千军万马,用 28 年时间,率领亿万人民,用千千万万先烈的头颅与热血终于换来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无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783 页。

和建设的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绝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给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中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文化侵蚀,以及我们对完全崭新道路、制度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使得我们党和政权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因此,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与客观历史现实以及他本人根本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出现的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想象和掌控的局面,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

中最终竟出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况，使得晚年的他在思想理论及精神上常常处于忧虑、不安、孤独、孤寂、无助、无奈甚至是伤感、凄凉、内疚、悲愤、痛苦的集合之中。晚年的毛泽东深深认识到，自己发动的这个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如他自己估计的那样“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①分明变成了现实。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几次背诵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其中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而常常涌流的泪水则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他“出师未捷身先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08页。

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态。任何伟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是被已有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则。我们决不能也决不应替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但也应高度重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伟人所犯的错误与他的巨大功绩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仅把伟人所犯的错误与普通人所犯的错误相比,往往会造成伟人的错误至大至重,不可饶恕,普通人所犯的错误至小至微,可以略而不计。这就常常出现一些普通人往往对已故去的伟人随时随地拉出来毫不负责地进行置评的现象。更须警惕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操纵之下,更是对毛泽东等伟

人公然进行无耻的谩骂、攻击甚至恶意地诽谤、造谣。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花钱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应对。否则，说得严重一点，就有亡党亡国之危险。另外，也有不少同志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些人所肆意歪曲、伪造的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铁案”，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所以笔者主张，了解历史特别是重大关键历史细节的同志，都有责任把历史特别是关键的细节真实地留给历史和人民。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其大略特别是把其放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7页。

标准”^①这架天平上去衡量，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历史对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各位“历史撰写者”所撰写的历史最终都会进行公正的审视，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都会格外关注，最终都将会对其辨析得清清楚楚，记载得明明白白。宋太祖怕史官应该是极有道理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等伟人巍巍然如永远屹立的昆仑，而那些丝毫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攻击毛泽东等伟人的，不过是毛泽东等伟人脚下的一抔黄土而已。还是让我们回到毛泽东晚年的泪水上来吧。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晚年常常涌流的泪水，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领袖的辉煌，反而使我们平添了对他的无限敬仰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90页。

之情。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而奋斗的一生。尽管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之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其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我国当前特别是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中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小册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

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特别是确保实现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有所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这可能是一个一时难以理清、讲清的大题目。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一是需要用一定的篇幅,二是有时也须引用一些必要的文献,三是笔者只能从自己所接触到的有限材料进行梳理和认识。由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敬请大家谅解与指正。

一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概念的提出

《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①，其实质，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第832页。

这一概念,主要反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但也同时包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持党和军队、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之所以只提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而没有把军队单列出来,是因为广义上的政权概念,已经包括了军队。至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也应遵照《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

神,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本小册提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提法,就是根据《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进行的提炼,是经过多次推敲确立的。其中,“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决议》中说:“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

方法。”^①“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邓小平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②“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提法的依据来自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谈话。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③“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④邓小平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这就坚定地划清了与苏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0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

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①但“从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这也就是说，这一严重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后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25页。

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第二次结合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但这种挫折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因此，本小册提出“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提法，是符合《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的。其中的“实事求是”是指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具体运用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语的重复。

什么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

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①可以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我们党《决议》中所说的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是如何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呢？《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8~809页。

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①“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9~810页。

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办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此定性,我们党才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1页

折”，^①才有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呢？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有这样的记载，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21页。

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①但是，本小册出版发行后，看到此小册的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于2012年9月6日给笔者发来这样一个邮件：“慎明同志：我拜读了你写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页上讲，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这个材料，我们在统《国史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笔者注）时也遇到过。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1782页。

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我们最后把这段话删去了。”201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正式出版发行，笔者查了查，经中央正式批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确实没有毛泽东于1976年6月13日所谈的关于“两件事”的记载。笔者认为，《毛泽东传（1949～1976）》（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都是经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国史的重要著述，根据治史和研究的原则，当出现对同一史实特别是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表述时，当然应以后一个出版物为准，即毛泽东于1976年6月13日所谈的他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一史实，还不能落实。2012年10月17日，笔者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逢先知，他说：“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主席已经失去正常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必

要的交流往往是靠张玉凤同志根据他的口型或他用纸笔与人进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经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毛泽东传》中所引的这一材料来自胡绳同志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所写的一篇文章。而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也明确说,他的依据是“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①。”在本小册修订版付梓之时,本想把这一无法证实的谈话删去,但又考虑传说中的毛泽东这一谈话在国内外都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所以,本小册修订版特把上述有关情况在这里报告各位读者,以便有兴趣的读者研究探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还有这样的记

^①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700062.html>.

载,“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①依据上述记载,应该说,毛泽东在其晚年至少两次谈过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从吴旭君和张玉凤的这两次回忆看,毛泽东无疑十分看重他自己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但这两次回忆都未提及像传说中的1976年6月13日谈话那样的更多的具体内容。因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45页。

此,那次谈话以及那次谈话中的一些具体而重要的内容仍然无法确认。

《决议》在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同时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①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4~815页。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①

《决议》距今已整整30年。对毛泽东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

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着种种评说。这些年来,国际国内的实践充分说明,当年邓小平和我们党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据笔者所知,当年有此误解的同志中,现在有不少人已完全转变了自己当年的看法。

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要反对两

种倾向,这就是《决议》中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①上述两种态度,都不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已经46年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34年前的上述讲话,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6~837页。

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科学论断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探索当中的正确成分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严格区别开来,从而牢牢汲取“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教训,避免“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重演,进一步科学、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加强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

近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的持续深入,使笔者更加感到理论的重要。但坚持和发展正确理论的前提是正确对待历史。近些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同时,也对1957年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进行了相关思考。思考中,总有这样一个问题盘桓在自己的脑际: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党的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

阶段,毛泽东的功绩如一座座巍峨的高山,让人敬仰;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毛泽东的种种错误为何突然涌显,让人扼腕叹息,反差如此之大,如夏冬意外之衔接,让人不可思议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来。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那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能不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或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呢?笔者认为同样不是,人的错误思想的来源也只能是社会实践。只不过,正确思想是对社会实践正确的反映,错误思想则是对社会实践的错误反映。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同样是来自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其肇始于何时何由?探寻此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轨迹,无疑有助于认识我们时代的变迁和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在建党、建军和建政的过程中,他一直高度重视保持党、军队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深刻论述党、军队和政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极

端重要性,并为此始终不断进行着认真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这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军队鲜明无产阶级性质战略思想探索的端倪显现于1927年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湾改编”。那时除了整编部队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雇佣关系;并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丰富完善为“八项注意”——笔者注)。“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标

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这不仅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丰富了党内民主和保持党的性质永不变色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同时也显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时。当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财夺妻掠夺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力主严

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1933年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明确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绝不姑息。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中明确提出:“财政的支出,应根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

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努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①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有过保

^① 刘宋斌编著《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纪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第38~39页。

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和反腐倡廉的多次精辟论述,但上述 1934 年的这段论述,十分重要,过去我们往往有所忽略。这一论述,实质上提出了实现人民民主这一更高更充分民主本质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这一思想,其实就是 1945 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思想的雏形。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进一步显现于延安时期。黄克功,1927 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 745~746 页。

连长、团长、旅长。1937年9月在延安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毛泽东随即致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①这对当时全党、全军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永昌演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但让他更加关注的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1944年，郭沫若应约撰写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00页。

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52页。

② 《毛泽东传（1893～1949）》，第691页。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更直接地表现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初。当时毛泽东会见到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政员黄炎培。黄炎培通过在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与一群生活简朴但又充满生机的共产党人的短暂接触，深信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全国执政，但他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

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毛泽东对民主的概念曾有多次明确阐发。1939年11月,他在《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又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②笔者认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通俗表达。毛泽东提出“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实质上是党在夺取政权前特别是在执政后永远保持党的根本性质、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从而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实质上这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第745~746页。

②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做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做主。当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选举本质上背后是由金钱直接操纵的，或由金钱直接操纵媒体进而间接操纵选民等手段而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在其形式上如都搞选举，在一定范围内都是一人一票和少数服从多数等，但在其内容即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做主。民主的名称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普世的是形式即过程，普世的不是内容即价值。在阶级或

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纯粹意义的“普世价值”。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1948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也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①这说明,这不仅是毛泽东当时的思考,也是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同思考。

这充分说明,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413页。

三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

1945年7月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之后，可以说，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课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心头。

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一个多月后，日本即无条件投降。1946年6月，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拉开大幕。三年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几乎全力指挥战争，但他十分强调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①1948年1月，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要求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87页。

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并明确指示：“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①军队内部开展的三大民主运动，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根本保障作用。

在三大战役顺利结束后的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知，建立新中国已指日可待了。如何跳出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可能又涌上毛泽东的脑海。他在会上警示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

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还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②应该说，这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历史的实践和发展，已经充分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去就失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62页。

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①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时间没过一年,即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来到哈尔滨,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视察。在哈尔滨吃第一顿饭时,他即发现招待得十分丰盛。他当即提出严肃的批评,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②2月28日,他到了沈阳,当地饭菜安排得比哈尔滨还好。上述两餐他都因同时从苏联返回的胡志明在场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而没有“罢餐”。在沈阳这顿晚餐他只用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第954页。

② 李家冀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82页。

了半个多小时。饭后，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①3月1日，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严肃批评并愤愤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②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心很快被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便频频出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

① 李家冀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13年》，第185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05页。

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①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同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十分忧虑，他甚至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②形容此现象。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改此《决定》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

① 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79页。

② 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第168页。

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 170 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 25 人。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②斗争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 1951 年底开始至 1952 年 10 月结束,历时近一年,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国县以上机关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207 页。

② 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查出贪污 1000 元以上的共 10 万余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等 42 人。据中纪委截至 1952 年 7 月的统计,参加运动的有 312. 2437 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 122. 6984 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 39% 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 20. 2683 万人,其中 6 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 2 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 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 25 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 576 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 3428 人。^① 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九大城市被审查的 45 万多私营工商业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 76%,其中上海为 85%,北京为 90%。^②

① 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第 186~187 页。

② 《新华月报》1952 年 3 月号。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当毛泽东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①事实完全可能如此。

对刘青山所犯错误，并非无人抵制。但刘青山振振有词地回应：“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种打天下、坐天下、享乐天下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党政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上述思想的熏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 152 页。

染,这种思想也不可能随着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而从一些人的脑海里消除。享受与特权、特权与腐败的界限在哪里,对于那些腐败分子来说,就更加分辨不清。

为切实保证我们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毛泽东为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耗费了大量心血。宪法从1953年底开始起草到1954年9月正式通过,历时九个多月,全国共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提出了5000多条意见,先后修改20多稿。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力主限制个人权力,并考虑到各个环节积极性的发挥和制衡。毛泽东说:“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①,有总理,又有个主

^① 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曾一度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议长和副议长,后来改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

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① 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后来,我国宪法几经修改,但仍然是建立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的,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从国家政治体制层面,从法律上保证发展国家的民主化,进而保障人

① 当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324页。

民的当家做主。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对新中国快速发展的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管理权是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所有权的根本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领导干部意味着冲锋在前、牺牲在前;而在建设时期,管理权的相对集中,也为一些官僚主义分子甚至腐败分子提供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追求特权享受的便利条件。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

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①

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只是刚刚破题。他在抓三大改造,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②的同时,对“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604~60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

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①的现象高度重视,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滋长的现象高度重视,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的现象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②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③ 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关于继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8~279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26页。

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① 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了22位中、小学教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为《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5月14日，毛泽东读了发言摘要，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②

有的研究人员认为，1957年的党的整风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46～24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468页。

一开始就是搞阴谋,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是误解。整风的本质,是要防止党脱离群众,保障党不变质。开展整风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和毛泽东同志明确肯定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①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72页。

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权思想。

但是,由于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迅即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他们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些人公然说:“现在政治黑暗”,“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毫不隐讳说“请共产党下台”。在此情势下,我们党不得不中止整风,被迫开展反右斗争。党的《决议》指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

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①《决议》的论断完全正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长期复杂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斗争还会发展为政治斗争。由于我们党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本人无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央其他有关领导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邓小平就坦率地承认:“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5页。

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①勇于承担责任，坦诚地作自我批评，这正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伟大之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几次小规模的正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1页。

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的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

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正好给这些领导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

在毛泽东的眼皮子底下的中南海,1958

年3月也发生了一起反右扩大化的“八司马事件”。就全国来说,此时的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的整风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进行。中央政治秘书室林克、戚本禹(戚本禹后来在“文革”初期做了不少坏事——笔者注)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认为这八个年轻干部“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当然是件大事。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当时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很是吃惊。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

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这才幸免于难。^①

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和新的“八司马事件”,可能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党总是在犯各种错误中,在一些同志遭受委屈的过程中取得成就而不断前进的。毛泽东委屈过别的

^① 参见霞飞《戚本禹沉浮录》,《党史博采》2012年第12期。

同志,但毛泽东本人也遭受过别的同志的不少委屈。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不实事求是地怪罪他甚至有人咒骂他。他离我们而去37年了,今年又是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他无言。但我们活着的人,就不能为他老人家讲点公道话吗?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受过委屈,就要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时隔50余年的这种自白,进一步证明了当年反右斗争的必要。当然,我们也应充分看到,党对当时右派进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确实估计得过于

严重了，在反右斗争时也确实采用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使大量的同志和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牵连。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使刚刚形成的民主空气被严重破坏，毛泽东原想通过整风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非但没有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助长了原来所要反对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1958年后，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抓经济建设，抓技术革命，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间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也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如何跳出周期率，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主题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在1958年5月20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一次严厉批评令人厌恶的官气：“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

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

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①毛泽东从一些干部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一官气的青藓之末,就看出了能否破除这一官气与能否摆脱历史兴衰周期率及防止出现大国沙文主义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政治敏锐性。

反右斗争后,毛泽东逐渐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重新作出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破除一些干部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同时,提议改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18页。

变了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从此,党的指导思想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方向逐步发展。这是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给中国政治生活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

四 毛泽东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思考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及对阶级斗争全局形势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估计

回顾和总结历史,我们还应十分关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

的后代将获得自由”。^①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②此

① 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11页。

② 《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1027页。

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这一方针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

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走向了极端,这是令人痛心并应永远汲取教训的。

从1962年到1966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方面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特别是1962年下半年对农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毛泽东与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的严重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建立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经济基础。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

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①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在会议《公报》中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97页。

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①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引用上述论述后指出:“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3、654页。

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①笔者认为,此画龙点睛的评述极为重要。

1963年8月,毛泽东会见非洲友人。当来自南罗得西亚(今为津巴布韦——笔者注)一位20多岁的使者问,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消失了,中国天安门的红星会不会消失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也害怕,中国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60页。

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①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是在苦苦思寻如何防止苏联党和国家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一关系党、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更加明确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②

在1958年“大跃进”中，毛泽东也曾一度头脑发热，全党、全国曾出现浮夸风、要求取消商品生产等不正常现象，但正是毛泽东最先察觉并开始纠正。为了从根本理论上解决问题，他一方面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建议大家一是读斯大林审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① [美]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78页。

② 《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

书》，一是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要求每人每本读三遍，以纠正上述偏错。另一方面，从1959年12月上旬直到1960年2月，他亲自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几位秀才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发议论。他在议论中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这两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

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同工人打成一片。他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

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毛泽东在议论中还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属于权利问题。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和劳动者管理上层建筑等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大问题。

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质的变

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联系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笔者印象中,强调得最为突出的有两次。一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示。他在其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很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

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①这则批示，对于当时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来说，显然是估计过重了。但是，若把这则批示精神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显然是我们党应给予高度重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与杜勒斯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战略家，不过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着根本的不同。二是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对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的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上的批注。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3页。

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这一批注中，还在薄一波注释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这些人”旁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①此批注表明他当时已判定：党内出现了一个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显然是把当时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并为他晚年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5～266页。

么办”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回顾毛泽东上述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当时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由于其他中央领导的

错误认识,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艺术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在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苏联党的演变进程,并始终结合国际斗争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建设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继续思考着国内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重大战略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1961年9月15日中央

常委在讨论《苏共纲领草案》时，毛主席说：“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

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①对苏联党的演变进程的关注,一方面,这使毛泽东的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峻和脱离实际。毛泽东于1964年2月29日与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谈。会谈中,毛泽东从国际上的反修防修斗争谈到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据有关材料披露,毛泽东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463~464页。

谈到,如果让像赫鲁晓夫一类的人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苏联共产党元老——笔者注)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毛泽东还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毛泽东对当时苏联党内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联系和延伸到我们党内,显然他是严重夸大了当时党内不同意见的状况,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接着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他还甚至明确表示:“我死

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① 会晤结束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对前来给他检查身体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

^① 邸延生:《历史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第331页。

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

据吴冷西回忆，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十年论战中，毛泽东对《九评》的写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回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吴冷西说：“毛主席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也是逐段边讨论边修改，而且他自己也动笔修改。”吴冷西还回忆说，“一次讨论中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

^① 邸延生：《历史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31～332页。

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后来我们根据毛主席6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举了他提出的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样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779~782页。

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

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

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先是简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近一两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②笔者认为,邓小平说的很准确。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说的并不都是全对的,言外

① 《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3~294页。

之意,也都不是全错的。1991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老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①经过近50年历史风雨的检验充分证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具有十分重大的深刻的现实战略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指导意义。

1965年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愈来愈形成这样一个固定看法: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32页。

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对此或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较大抵触情绪。这就使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更为严峻。

2012年11月15日,在中央警卫局专门从事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整整40年的王振海告诉笔者,“我亲耳听到我们老局长张耀祠说,1965年,毛主席到外地视察,饭后我们陪老人家散步。散步中,毛主席说:‘我多次给你们讲,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厌了,听得耳朵结茧了,我还要讲。免得将来你们受苦时,怨我这个老头子事先没有给你们讲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在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时,仍笃信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

革命理论”的正确。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阐发井冈山精神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①他还说,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

^①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第174页。

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①“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

^①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第 177 页。

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他还说:“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①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党已经变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其根源是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结果在苏联逐渐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次重上井冈山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对

^①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第 174 ~ 179 页。

陪同自己同上井冈山而中途离开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当众大声说道：“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①不少党

^①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第 151 页。

史、国史专家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真正的重大分歧，实质上是从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上开端的。若真如是，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为什么邓小平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寻求突破等，都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此时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虽有正确认识，但对阶级斗争的全局形势却作出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估计。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实质上也是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如何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

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①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这样一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4～1396页。

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①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在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中,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五一六通知》发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来到他的故里韶山“滴水洞”整整静思了11天。到达武汉后的7月8日,他写下了著名的《给江青的信》。40多年过去了,回顾昨日风尘,重读这2000多字的信件,令人诸多感叹。笔者基本依据此信文字的先后顺序,在这里简要归纳毛泽东在该信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概要。

^① 《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一是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规律性表现。如“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任务（即当时已经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笔者注）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二是对此后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必然要跳出来的惊人的洞察力。在毛泽东谈到“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之后，即谈林彪的关于政变的讲话（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

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笔者注），并明确指出：“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联系到此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我们不能不惊叹毛泽东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在写下“人贵有自知之明”之后，毛泽东即明确提醒和规劝江青：“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联系到此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指江青——笔者注）会闹事”^①等严厉批评及江青的下场，我们更加惊叹毛泽东见微知著的洞察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5～396页。

三是自我解剖,即既有虎气,又有猴气。毛泽东喜欢和赞成鲁迅的“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的信条。在信中,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充满自信即虎虎有生气;另一方面,他对林彪对自己“吹得神乎其神”,对当时党内和报刊上对自己的铺天盖地的吹捧,应该说是比较清醒的,并且很是不以为然。毛泽东说:“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正说明了毛泽东的清醒即身上的猴气。

四是对“文化大革命”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这一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还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文化大革命”，而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毛泽东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通览此信全篇，笔者认为，这是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右派当权之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实质上指毛泽东思想——笔者注）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而在“右派当权”之前，“演习”性的“文化大革命”还要有多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右派当权”。

五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前景的展望。一方面，毛泽东准备历史走一个大的曲折。他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指共产党——笔者注），大多数

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但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判定：“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① 有人认为，此信的重要性可与《五一六通知》相并列。而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此信的重要性、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远远超过《五一六通知》，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自然生命。此信是真正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对他一生干的第二件事前景估量的锁钥。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可以把此信看做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74页。

泽东的“政治遗言”。这封信既体现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一些十分宝贵的思考,但也十分可惜,他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甚至表现出他不惜与多年并肩行进的战友们相“决裂”进而“准备跌得粉碎”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总之,此信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大精深,正确揣度毛泽东的深邃思想和远远超出常人的战略眼光,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年月,更需要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否则,人们还往往以为他的一些正确的话,是一些“颇有点近乎黑话”。

毛泽东也深知,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办法,极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称

为“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首先运用什么力量来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呢？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并对此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会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

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①从一定意义上讲,明知大潮一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但毛泽东不惜身败名裂,也要决心一搏。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②经过长期并艰难的思考,毛泽东认为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33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20页。

自己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这种十分危险前景的出现。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原曾设想仅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一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①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89页。

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联和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五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②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2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87页。

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问题,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 205 名中央委员中,有 65 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 31.7%。其中,25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 7 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 28%。而最高层的 7 名政治局常委中,有 4 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 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

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当然,我们也决不否认,其中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极大的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毛泽东本人和我们党的工作上的失误,但有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所为,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笔者接触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有不少仍对当年的吃苦有不少怨气,但相当数量的同志对此无怨无悔,甚至常说:“这是我毕生最难忘、最值得记载的岁月。有上山下乡‘这杯酒’垫底,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对付。”毛泽东当年可能曾经这样设想过,把 1600

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和亲戚对自己可能会有不少抱怨、怨言甚至怨恨，但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他自己甘愿担待这样的“骂名”甚至“罪名”。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的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刊载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毛泽东重要谈话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此时，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其间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使得毛泽东在这一期间的谈话更具沧桑之感。从目前查到的史料看，此间的谈话，也是毛泽东一生最后的关于理论的最重要的谈话。从一定意义上讲，此谈话也更能直接反映他当时的内心世界和他对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反思和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

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

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

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①此谈话中,毛泽东对自己晚年的错误有所反思,但显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他都仍然坚持认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在这一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如下论断分外引人瞩目:“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有同志认为,此段谈话十分荒谬,这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对我们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彻底否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489页。

定,否则,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也有同志认为,此段谈话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欠科学和准确;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但绝不能将其扩大化;此段谈话正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论断在其理论上的误区,我们决不能重犯此错误。还有同志认为,此段谈话十分重要,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和原动力,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腐败和保持党与政权永不变质应当努力的方向及工作重点。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中,第二种观点更符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议》的精神。但其他两种观点,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特别是理论界,也都有着一定的表现与反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确保我们党和政权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

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到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给我们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思想政治领域,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错

误是在于过分夸大了我们的阴暗面并采取了一些极其错误的方法,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干扰和破坏,使得毛泽东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却不幸酿成晚年错误的悲剧。但毛泽东却始终认为他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并把这看成是他一生中办的第二件事。这是很令人惋惜和叹息的,也是他个人的悲剧所在。

五 相关思考

1. 一定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前 27 年艰辛探索并取得伟大成就之间的关系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不会搞经济建设,只会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一误解,往往影响着对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的正确评价。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也确实有失误,我们应认真汲取教训。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不是事实。这种误解,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党不变质思想正确的物质和经济基础。毛泽东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失误相比,成就不仅是主要的,更是伟大的。我们就从经济建设上说,

新中国建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从 1840 年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 年至 1949 年这 109 年期间,我国对外共签订 1100 多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间接掠夺了我国大量有形和无形的巨额财富。1949 年,我国钢产量仅有 15.8 万吨;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又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旧中国积弱积贫,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形容词。新中国一建立,并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过,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美国,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还在我国解放战争之时,西方强国便协助蒋介石政府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即对我国实行了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等

西方强国对我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对苏联东欧国家竟还多出**500**多项。但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新中国前27年的伟大成就：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

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所有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我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持抵制。此后，苏联又开列相关的所谓小打小闹的“援助”方案，不过是想重新诱骗我国在台湾主权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让步。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

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①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 52 亿余元（其中 60% 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 1965 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一直是全国生产粮食和生猪的大省。现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1548 页。

郑州市金水区一基层单位党总支书记的宋丰年曾告诉笔者：“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郑州市肉联加工厂生产一线劳动过。该厂连续几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运往苏联还债。”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

的核潜艇不是核动力潜艇,而是意味着具备了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第二次核还击能力的核潜艇,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 1988 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①,这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上两条,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的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研发,又全部是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 27 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 84000 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 4 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65 岁,而印度 1952 年人均预期寿命 41 岁,直到 2011 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 65 岁,整整比我国晚了 35 年。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加入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上五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并且十分耗时。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又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影响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前进和发展的基础。”^①邓小平说得好:“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作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07~11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

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①的重要结论,深得党心民心。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曾吃过草籽和榆树皮等,但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建国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自己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忍饥挨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

^①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第1版。

乃至最终形成而作出的个人极其微薄的贡献。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的“懒鬼”,就否认我们当年为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血汗。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别有所图。

2. 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

正如本小册第一部分所谈,要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不能因

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二是不能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反对这两种倾向,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应充分看到,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特殊重大意义。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①此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

的《决议》也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①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25页。

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①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写”^②的指示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充分证明邓小平关于“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③的结论有无比重大的政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恰当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保证我们这 30 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的政治共识和思想理论基础。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绝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评价的小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关涉我们党、国家、人民和军队的根本前途。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就有可能重新步入黑暗。这不是危言耸听。毫无疑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

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决议》作出后，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衷心拥护。但国内外别有用心的总是寻机对毛泽东进行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直接、最便捷、花钱最少但却最有效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否定斯大林以至列宁。

什么叫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

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读的叫做“历史”的课本或书籍或相关文章,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或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或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是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的。恩格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①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573 页。

现在的网络上和有的小报小刊上，总是在否认资产阶级的残忍，宣扬他们所谓的人道和文明，骂我们共产党人残忍。这是事实吗？

资本主义大国、强国是如何发家的？从16世纪开始的300年历史中，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投机者从非洲运到美洲、阿拉伯国家、波斯等地的黑人奴隶，包括在猎捕和贩运过程中死亡的黑人总数，大约使非洲损失6000万人口。^① 按照美国一些学者研究，哥伦布来到美洲的时候，居住在目前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为3000万到1亿，到20世纪70年代，按照美国官方提供的数据，还不足80万。^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愤怒地写道：“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

①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第23页。

②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385页。

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 40 镑；1720 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 100 镑；1744 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 12 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 100 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 105 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 50 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 50 镑！”^①

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也有所表现。1947 年，杜鲁门政府即开始实施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先后调查几百万名政府雇员。1949 年，美国工业组织协会解除了 11 个成员超过 100 万人的所谓受共产党控制的组织。美国驻外大使馆里被认为有颠覆言论的书籍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863 页。

部被销毁。很多公务员、学者、演员等也都受到攻击牵连。调查甚至涉及军方高级领导。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时代”，美国当局总共抓捕甚至杀害了多少美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是铁幕，无人知晓。有人为美国当局辩护，甚至说美国没有“麦卡锡时代”的迫害。这样的人至少是不了解情况。1950年2月，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表演说，声称他手里有一份当时正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甚至连在1945~1947年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处”、先后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马歇尔将军也受到牵连。共产党员从1947年的8万人降到1954年的2.5万人。^①到1956年，有150多名共产党领导被捕。被捕

① [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下卷(1865~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908~913页。

的阴影很快便遍及数千名美国公民。^① 艾森豪威尔政府 1953 ~ 1960 年执政期间,进一步在各政府机构中实行清洗 3002 人。^② 而 1965 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杀害 50 万 ~ 100 万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连当时的美国媒体也报道说,甚至河水都被染成红色。而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这些史实几乎也无人知晓。1957 年的反右,我国划了 55 万右派,毋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使这些同志遭受极大的苦难,并使其不少亲属朋友受到不应有的牵连,这一深刻教训,我们当然要永远牢牢记取。但在 1957 年的反右当中,我们却没有因为有右派言论而处死一个人。网上说 1957 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

① http://archive.org/stream/TheUltrasInTheUsa/UUSA2_djvu.txt.

② 张海涛:《再说美国》,北京出版社,1991,第 188 ~ 189 页。

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又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给笔者几次谈过:“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的特务,来刺探我们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

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
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
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
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
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
机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
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曾十分气愤地
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
实味放在你们 359 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
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笔
者经过批准,也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
料,完全证实了我的老领导的说法。我们的
反右划了 55 万右派,没有杀死一个,但却
被他们记述成比他们在印尼杀死 50 万~100
万人还要残酷的“历史”,相当多人都在谴
责我们的反右,但他们杀死 50 万~100 万
人的这一累累罪行却几乎无人知晓,更无
人谴责。

我个人在这里决无丝毫之意替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他相关各级领导的失误和错误辩护,但国际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包括在我国内注册的有的网站就是这么和这样的“客观”、“真实”和“公允”吗?!

1994年,海外出版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笔者曾在中南海工作十多年,与毛泽东身边多名工作人员有过接触。看到此书中对毛泽东的攻击特别是私生活的描述后,即找到毛泽东去世后仍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整理毛泽东图书的周福明。早在1960年,周福明就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兼管毛泽东的理发。周福明看了李志绥所谓的回忆,十分气愤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恶意编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席身体很好,很少吃药。要吃就是安眠药。安眠药都是我们警卫战士去拿的。李志绥

基本接触不到主席，何来他所看到的主席的所谓私生活?!”李志绥 1988 年到的美国，带去的仅是一本薄薄的手稿。当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人找到他，说你这本回忆录没有可读性，没有市场效应。同意润色，一种说法是 100 万美元，另一种说法为 50 万美元。至少李志绥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他所谓的回忆录即由别人捉刀代笔，变成了厚厚一本。书中把他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的时间从 1957 年 6 月提前到 1954 年 4 月。我问读过此书的同志有何感受？甚至有的高级干部也说：“开始不信，读着读着就信了。你看，书中所说的党的八大前后的事，大部分与我们党史里记载的一模一样。”我也向一些党史专家请教并探讨过。其实，书中对党的八大前后的不少所谓回忆，完全是照抄我们党史的。此处真实，就是为了刻意掩盖李

志绥对所谓回忆与毛泽东私下接触和私人生活的恶意伪造。笔者建议读过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伪历史著作的能够读一读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克、吴旭君和徐涛为批驳李志绥谎言而写的专著《历史的真实》。感兴趣的读者还可在“百度”输入并搜索“戚本禹批判李志绥”关键词。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戚本禹在此事上替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1966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

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一书的作者马社香曾采访过朱旦华。马社香告诉笔者，朱旦华也回忆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长沙到井冈山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上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主席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酒水。”笔者还请教过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陈晋。他说：“1928 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

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要弄我们。”当然，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很有感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结的婚。当时，袁文才、王佐考虑的不是没有道理。1929年，当毛泽东、朱德率部队出击赣南后，当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领导人对袁文才、王佐还是不放心，把他们错杀了。

英国情报机关也资助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出版。1991年笔者见过张戎本人。2008年，笔者访问英国剑桥大学。几位学者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可以不讨论张戎的书。里面的逻辑矛盾就比比皆是。”连法国一家报纸在报道此事时也说：在张戎等人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声名狼藉，而毛泽东的肖像却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戎要移动这张肖像。

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被国际资本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不少国家出版发行。中文版也从香港、台湾等地带回到大陆不少。拿破仑说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

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

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

早在2010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有危害,并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十分重要的组成,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组成。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能否恰当应对

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国际资本操纵的对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邓小平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攻击,这对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抵御他们的西化、分化,以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一定意义和一定范围讲,敌人比我们强大的只有这样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不顾起码的良知与道德,用造谣这一极其堕落和卑鄙的武器击人。但历史的经验也已反复证明,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得越痛,谁就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攻得越烈,但广大人民群众最终都会辨析清楚,把谁记得越牢,对谁越亲。

下面,请允许笔者再用一定篇幅列举几段相关谈话进一步说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今有关领导同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一是周恩来的一段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笔者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从这段谈话,也可以反映出1956年毛泽东在错误批评周恩来反冒进之后,周恩来违心检讨的心迹。

二是叶剑英的一段谈话。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笔者:“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师等其他入,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三是黄克诚的讲话。黄克诚1959年在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斗争中,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工资降两级,20年没有工作。但1980年11月27日,他却不顾年迈体弱,几乎双目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中央纪委召开的座

谈会上作了四个多小时的报告。在此报告中,他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

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

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①黄克诚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黄克诚的这篇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动得热泪涌流,为他这种出于公心、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品格所折服。**1980年黄克诚的重要讲话**,在今天无疑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

不仅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同样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①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12页。

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同志!”^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②习近平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韶山的骄傲,湖南的骄傲,全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今天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642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41~642页。

我们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好、发扬好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①他还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②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中华民族世代代将永远铭记在心。

2011年6月2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他说:“‘文化大革命’

① 《湖南日报》2011年3月24日。

②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期间,我母亲^①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

① 指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

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还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①俞正声这番肺腑之言和坦荡无私的品质与胸怀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俞正声这些论述也进一步说明党的《决议》和邓小平相关思想的正确。

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沙文主义,也决不能搞意识形态的输出;但是,思想理论无国界。笔者认为,从时

^① 《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南方周末》2011年6月23日。

间顺序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后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成果。从逻辑顺序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两大成果,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党的生机活

力；始终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坚持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在走向世界。随着以西方强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富愈来愈少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其根本标志是几乎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现象的进一步加剧，广大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在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极有可能学习、借鉴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即给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议会选举直至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真正实现本民族的本质上

的独立和解放。待到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掌握了政权之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就可能会学习和借鉴我们党的保持本色、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的经验。无论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执政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都是十分杰出的主要贡献者或者说奠基性的贡献者。因此,笔者坚信,21世纪毛泽东思想必然进一步走向世界,或者说,21世纪是毛泽东世纪。笔者愈来愈加坚信这一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一样,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和昭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反映和揭示的往往都是几百甚至上千上万年的事,决不能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若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

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就必然是没有弄清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真谛。

3. 一定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的的错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正确区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破坏

一是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党、军队、政权建设实践中十分重要的运用,是我们党、军队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特别是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今时代更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会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轻率否定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决

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①按照《决议》这一精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应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论，必须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②这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809 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808 页。

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做是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悲剧和教训。我们要时刻引以为鉴。右倾错误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倾错误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重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发生。

二是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

践所犯错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看到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其他重要甚至是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晚年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

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握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外交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革”内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与毛泽东

的决策贡献和影响作用分不开。

三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所进行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 and 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 and 实践中缴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

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①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曾经与其女儿章诒和有这样一段对话,可以为毛泽东关于“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作注释。章诒和问其父亲章伯钧:“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章伯钧用一句话回答了章诒和:“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②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第17~19页。

②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58页。

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绝不是普通的人，绝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再说，他人难道没有感情用事或犯错误的时候？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本小册前面已引用过邓小平和《决议》的不少论断，并在这里又引用了毛泽东早年的心迹作答，不再赘述。但这里需要回答的还有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泽东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长期不

满,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用群众运动帮助这些干部改掉他们身上的官僚作风,“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他对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之前他就明确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②当时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对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8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49页。

得力”。所以，毛泽东采用各种方式办法发动群众，甚至提出“来一个放任自流”。^① 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同宗派等各种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② 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设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③ 但结果，“文化大革命”整整进行了十年，风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无法了结。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一方面把全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40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40页。

③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90页。

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大乱并未转化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现无法驾驭的局面，这令毛泽东处于十分无奈甚至尴尬的境地。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张耀祠回忆说：“1975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强调指出，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总理感到这是一个解放老干部问题的机会来了。这天他来看望主席，并向主席报告了有无数的老干部挨整，他们一直没有工作等情况。主席说：‘你说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我也是无意地把他们打倒嘛，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老同志受罪嘛！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烧糊了就不好吃了。’”^①从中可见，

^① 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第141～142页。

毛泽东当初的良好动机与实际结果是严重相悖的。

其二，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其动机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观动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相统一论者。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往往会产生相应的客观效果。但是，有时也往往会出现效果与动机完全相悖的情况。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就是指这种现象。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当然应该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同时也应兼顾历史人物的动机。对其动机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肯定。与此同时，不仅要把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放在当时历史环境里进行考察，同时也应放到历史和时间的长河里，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加以

检验。这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才是真正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真正反映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

其三,毛泽东在晚年已经部分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有所纠正**。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反思与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

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①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即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②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并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3、145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31页。

一次。在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对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检讨,他说:“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①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②,等等。

其四,要正确总结认识毛泽东晚年所犯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15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8页。

错误的原因。黄克诚在1980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

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

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①

四是正确区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1972年2月21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历史性的会面。会面中，尼克松对毛泽东说：“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可能也没完全料到，“文革”中竟出现包括要暗杀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在内的个人极其复杂的情况。当他回

^① 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

答尼克松说他“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时,实质上反映出他对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无奈。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与毛泽东发动初衷严重背离的悲惨结局,除了与他个人的错误有极大关系,与一些人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什么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一种顽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分两种基本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特点是: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出发,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问题,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

离。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什么是个人主义?就是指不顾及他人和集体利益仅从个人利益出发决定自己行为的人。什么是官僚主义?就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笔者在本小册第四部分谈到的朱仲丽同志所说的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把本来不属于右派的干部群众打为右派的情况,就是一些干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加官僚主义的结果。什么是宗派主义?就是一种放大的个人主义,是为谋取不正当个人利益的人的集合体的小团体主义。什么是山头主义?大家知道,这是特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团结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林

彪反革命集团所说的只有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中“红一军团”出身的干部才好重用,就是典型的山头主义的表现。有着严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倾向的人或群体,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或不自觉利用运动中各种“口号”和形式,往往“运动”与自己或群体不同意见的人和群体,甚至把他们“往死里整”。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把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作为整风的三项主要内容之一,过去笔者理解得不甚深刻,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这次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笔者更加认识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派主义对我们党的特

有危害。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会绝迹,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样不会绝迹,必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新的表现。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历史中,有过严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并出现与此相关的错误,这严重干扰了党的正确部署的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把一些错误部署放大,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曾出现了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这三种人与犯了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错误的同志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人,千万不能混为一谈。什么是蜕化变质分子?就是原来是我们的同志,后来经不住种种诱惑

和考验,背叛了原来正确的信仰,实质上变成了党和人民敌人的人。什么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强烈不满,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样子,混入我们党和政权内部来破坏革命的人。什么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在我们党和政权内部,采用两面派等手法在党和国家的高层攫取领导岗位,并处心积虑地利用已经攫得的权力,运用各种合法、非法及阴谋手段,企图通过影响甚至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由于这样的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对我们党和政权的破坏作用更大。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中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我们队伍内部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把“文化大革命”推向

了“左”的极端,对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起到十分独特的作用。我曾在我十分敬重的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十余年,20多年前即在苏东剧变前的1985~1987年期间,他曾几次对我说过:“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应该也必须充分肯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有两个错误,一是打错了人,二是用错了人。”绝不是因为笔者曾是他身边工作人员对他有深厚感情使然,笔者认为,我的老首长和老领导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冤有头,债有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我们党和国家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除了有毛泽东本人应负的领导责任外,不妨查一查,特别是受到冤枉的本人和亲属及同事认真查一查,这往往与一些人的严重主观主义特别是假借运动之名,或挟私报复,或借以邀功,或篡党夺权等有关。从

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些人应该负有更直接甚至更大的责任。而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坚决反对这些做法的。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几次明确肯定毛泽东发动历次运动的动机是好的的根本依据。我们决不应替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作丝毫掩饰和开脱,但是,实事求是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原则甚至生命。我们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清不同的责任。现在,有的人把这些责任全部推卸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用句通俗的话说,这样的人不地道。如果把我们党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全部归结为大家,而所犯的所有一股脑儿全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这对老人家极不公道,更为重要的是,这要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因此,我们在评价“文化大革命”时,必须把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

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区别开来。

4. 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1979年，邓小平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忧国忧民、忧党啊！”^①1980年1月16日，即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就严肃地指出：“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②1982年4月，邓小平强调：“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0页。

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①1985年5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②1989年5月,邓小平又强调:“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124页。

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①1989年9月,他强调:“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②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

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①1993年2月,他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②邓小平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多。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③他还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④“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忧患意识,要忧党忧国忧民。首先要忧党。如果不这样认识和提出问题,如果听任各种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

③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496页。

④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236页。

体、恶化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那就难免出现杜牧所说的‘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局面。”^①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②2012年1月9日,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4页。

② 《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① 习近平强调：“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②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上述相关论述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关于党执政后党与政权有可能改变其本来的性质甚至亡党亡国这一重大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

5. 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25日在

① <http://e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831877.html>.

② 《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

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大反斯大林。其实质是开始脱离、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大反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①1959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4日晚，毛泽东就国际问题亲笔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13～329页。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而“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①1961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②结果,五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32~1034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1页。

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后果的估计判断惊人地准确；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深远意义，这是保证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重要保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认为：“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①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正确，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28页。

发生的政治风波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的教训充分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邓小平在晚年从苏联亡党亡国的角度实质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说：“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我们党出问题，整个国家肯定出大问题。”他还说：“垮下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下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

会出事。”^①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先后也曾作出了同样的相关论述。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理论上坚持与发展,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的同时,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不断总结历史 and 实践经验,以找到一条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前进道路。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长期执政,直至最终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

6. 必须牢记毛泽东的嘱托,始终坚持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① 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人民出版社,2012,第66~67页。

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之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邓小平这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分别出现于苏联和中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林彪、“四人帮”这样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分别出现于苏联和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都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伟大历史人物为人民和人类历史进步所建立的伟大功业决不主要是个人有限的天赋和努力,机会

主义的罪过也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的偶然现象,而是也只能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领袖式人物,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代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阶级及阶层,主要是指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任何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及阶层一旦形成,对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必然产生反作用。任何剥削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甚至企图

“终结”和固化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及其代表人物,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绝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

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反复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所有传统所有制和与其相适应的所有传统观念送进历史的坟墓,真正实现人类大同。这也又一次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有了千百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是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最可靠的组织保证和机制保证。

7. 一定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比较清醒的。他在指导思想，还是主张生产力与上层建筑同时进行研究，而不能举此而遗彼。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严重性的错误估计，他越来越多地关注上层建筑，忽视了对生产力的研究，而过多地关注上层建筑的研究，这就逐渐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出了“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以致出现一些人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生活习俗都当成“封、资、修”毒物一概批判、打倒,这就造成了历史的曲折,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若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对这种阶级斗争决不能扩大,但也决不可熟视无睹。如何既正视阶级斗争的存在,又不搞扩大化,确实有很大难度。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

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①“文革”结束后,1980年,邓小平强调:“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②斯大林在1937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消失了,是在理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他的无比英明之处。邓小平在对起草《决议》的意见中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3页。

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①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兼顾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由此派生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领域等各个方面，就是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至关重要。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成就的今天,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在经济领域,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就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初次分配中努力实现公平,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根据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的根本经济基础

和物质条件。只有坚持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才能有效克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有效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有效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和发展,确保党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永不变色。从而也才能有效加强社会管理和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在政治领域,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继续探索我们党在执政的条件下,逐步建立适应不断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创新机制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竭诚服务。只有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贯彻落实在

我国的各个领域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党和政权才有光辉灿烂的前程。

8. 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必须牢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殷教导,并切实身体力行

曾给毛泽东当过12年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回忆说:“我从1964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一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

“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就是一日三餐，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有个小灶，他对他的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他没有补过钙，吃得很简单，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

他的粮食定量 17 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为什么困难时期能渡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人民的领袖。”说一个借条的故事。1945 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 1969 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 多平方米的仓库 5 个柜子,主席 3 个,江青 2 个,还有

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两床毛巾被，冬天三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给主席送别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

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①前不久,笔者听说党内资历很老的一位老大姐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得更厉

^① [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 = shilin&threadid = 1399008&pageid = 3#p1](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shilin&threadid=1399008&pageid=3#p1).

害了”。笔者四处求证,最后,又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局从事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整整40年的王振海那里得到了证实。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事例甚多,无须再细加列举。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不知他做到否,但是毛泽东讲“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则完全做到了。正因如此,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1994年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后留下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题词。我们党在执政后,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与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能否身体力行息息相关。廉洁清正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清正廉洁。在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上,

为什么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身体力行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江泽民反复强调“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也正在于此。另外，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若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可能以权谋私，并可能滋生并助长私心，就可能在作决策、定政策甚至制定路线方针时掺杂私心，作出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全局和长远的事情来。因此，党的领袖集团带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有着极其特殊重大的意义。习近平在新就任总书记后特别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①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第4版。

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①这是一个十分普通而又极其深刻的道理。而这样的道理,往往是以自由甚至生命直至党和国家的兴衰为例证,我们才能逐步加深理解并感到它的如大山般的分量。当然,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深厚理论功底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以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最可靠、最坚实基础的。

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是直接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和长治

^①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第2版。

久安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甚至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人民是永生的,只有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与人民一道永生。仅从个人和家庭私利出发,任何人都只会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一、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严

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这是多么好的规定呀!!! 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腐倡廉和加强党的纯洁的坚定决心,增添全体党员乃至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无限信心。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

八届新的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①习近平强调的这一思想，实质上就是毛泽东早就提出的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的新表述。这就抓住了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现在存在的所有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若用这一战略思想统筹全党、全国、全军的全局，我们的各项工作就必将能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就一定会有一个无比光辉灿烂的前程。

^①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第4版。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推迟多年和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今世界无疑已进入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的前夜。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样重大矛盾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效需求之间这一根本矛盾。这一根本矛盾的加剧,也必然呼唤着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复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尽头是社会主义复兴,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时势造英雄,这也是一条铁的法则。可以预言,随着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复兴的到来,随着世界各

国工人阶级的成熟与壮大,也必然成长起一批又一批叱咤风云的世界级的领袖人物来。我们热切期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涌现出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世界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不断加强各自政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并团结带领各国人民共同为全人类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全世界全人类的前景最终必然是无比美好的。这就是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最高、最终的自信,也是我们中国梦的最后归宿。

该来的必然来,当然,该去的也必然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今天,我们会有比10年前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多一些新的更深刻的认识。